

2007年臺灣經濟史的回顧與展望*

The Past and Future of Taiwanese Economic History, 2007

林玉茹 (Lin Yu-ju) **

近年來，臺灣史的總體研究成果，從政治史、經濟史以及社會文化史三大領域來比較，經濟史研究數量明顯屈居末位。¹ 2007年仍然反映這個趨勢。根據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編《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 2007年度》的統計，2007年政治類研究共308篇（本）、經濟類144篇，社會文化類362篇。² 雖然，社會類和文化類可以進一步區分，但經濟類篇數仍明顯最少。近年來新文化史研究風潮洶湧，相對地經濟史研究似乎不再熱門，可能是兩者篇數消長的原因之一。

上述這項統計數字包括中文、英文以及日文的臺灣史研究論著。如果僅就臺灣本地的經濟史研究成果而言則更少，僅99篇。³ 這些專書論文，根據其主題和數量，大概可以分成經濟政策與發展、土地關係史、移民史、水利史、交通史、產業史、工業科技史以及貿易史等八大面向。儘管部分論文性質多元，要清楚分類有其困難度，但為了瞭解經濟史總體研究趨勢，仍予以大致分類。其次，為了有利於國內外學者掌握臺灣史研究成果，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自2005年陸續出版《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其收錄研究論著的標準，一開始即採

取嚴格的學術判準原則，主要收錄具有歷史研究取向與學術規範的專書與論文。⁴ 因此，本文僅討論較重要的研究論著，學位論文則因尚未正式發表，以存目為主。以下以臺灣本地的臺灣經濟史研究為對象，說明各領域的重要研究成果和趨勢。

一、經濟政策與發展

2007年著力於經濟政策、制度及經濟發展的論文共13篇。主要課題偏重戰後時期，特別是有關經濟政策、專賣制度以及物價等問題。陳慧先〈半斤八兩？清代臺灣度量衡之探討〉一文，⁵ 是唯一一討論清代臺灣經濟制度的論文。該文大概介紹漢人和原住民使用度量衡的習慣，並探討清末開港後西式度量衡制度對臺灣的影響。不過，該文主要整理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的調查資料，僅能反映清末狀況，稍嫌可惜。

戰後的經濟發展是最受社會科學研究者注意的課題。主要分成兩部分，一是注意戰後初期特殊的經濟現象，或是經濟政策與二二八事件的關係；另一是從長期

* 本文依據2008年12月4日中研院臺史所舉辦的「2007年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所宣讀的論文修改而成。本文的完成感謝以下學者提供相關領域研究成果的評論和資訊，謹此致謝。經濟政策與發展：李為楨；土地史：何鳳嬌；移民史：張素玠；水利史：陳鴻圖；交通史：蔡龍保；產業史：高淑媛、謝美娥、曾品滄；工業史：洪紹洋。

**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 1 戰後臺灣史研究成果的回顧，參見：林玉茹、李毓中，《戰後臺灣的歷史學研究 1945-2000：臺灣史》（臺北：國科會人文研究中心，2004）；臺史所研究文獻類目編輯小組，《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2004年度至2006年度（臺北：中研院臺史所，2005、2006、2007）。
- 2 臺史所研究文獻類目編輯小組，《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 2007年度》（臺北：中研院臺史所，2008），頁IV。
- 3 這個數字已予以校正，補遺了《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 2007年度》一書的遺漏，同時刪除部分非學術性專書論文篇數。在職進修班碩士論文因素質參差不齊，亦不列入計算。
- 4 詳細收錄原則，參見「編者序」，《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 2004年度》（臺北：中研院臺史所，2005），頁III - V。
- 5 陳慧先，〈半斤八兩？：清代臺灣度量衡之探討〉，《臺灣文獻》58: 4 (2007. 12) : 203-236。

觀點論述臺灣黨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或是與民主運動的經濟發展關係。前者以翁嘉禧、吳聰敏的研究為主；後者以張清溪和瞿宛文為主。翁嘉禧的《二二八事件與臺灣經濟發展》是第一本從經濟政策分析二二八事件的起因及事件對臺灣經濟發展之影響的專書，⁶ 有其創新意義存在。全書共十章，全面檢討戰後初期的土地與農業、工業與公營事業、貿易、財稅、金融等政策。該書指出雖然戰後初期行政長官公署採取一連串政策來恢復生產、平衡財政收支以及因應中國內戰，然而因各項政策缺乏整體性和一貫性，導致效益不大，甚至引發二二八事件。翁氏此議題的相關研究尚有〈二二八事件時期臺灣經濟政策的特質及其影響〉⁷ 可參考。吳聰敏〈臺灣戰後的惡性物價膨脹（1945-1950）〉，以作者過去的研究為基礎，說明臺灣戰後惡性物價膨脹的原因以及美援在物價穩定中扮演重要角色，學理與實證俱備。⁸ 然而，本文從貨幣經濟學面向切入，似乎較忽略戰後物資匱乏、生產不足所造成的物價膨脹問題。

張清溪〈臺灣黨國資本主義的興起〉，⁹ 主要說明臺灣陷入「黨國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歷史過程，以及其對臺灣經濟結構與政治經濟發展的影響。作者主張黨營與公營事業所建構的臺灣政治經濟體制即為黨國資本主義。不過，該文對於黨產規模的估計仍相當粗略，值得進一步檢證。張氏另有〈戰後臺灣的經濟發展〉一文可

參看。¹⁰ 瞿宛文對戰後經濟的發展則有不同看法。他的〈臺灣戰後經濟發展與民主運動〉一文，¹¹ 認為由黨國扶植私人資本進而互相結合的過程，應稱為官商資本主義而非黨國資本主義。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則對維持與延續經濟發展已經產生不利的影響，但比較南韓經驗，經濟與民主發展並非必然相剋。臺灣的民主化強調「外來」與「本土」的省籍差異，批判黨國資本主義之惡，然而本土論述卻又缺乏由國家推動經濟發展的思維，更無法幫助臺灣因應全球化的競爭新局以及因新自由主義而帶來的分配不均問題。瞿氏的論點很有啟發性，但仍必須進行更細膩的驗證。又有〈戰後臺灣經濟成長原因之回顧：論殖民統治之影響與其他〉一文，¹² 從「日本殖民統治是否帶來臺灣戰後工業化」這個命題切入，綜合回顧戰後以來的各種論述，同時比較南韓學者在此問題上的論爭。該文指出過去研究鮮少討論決策者的目的與意圖為何，且分析方面基本上有結構決定論的傾向，而沒有處理主觀或文化因素的作用。因此諸多論述，仍有爭議。此外，戰後技術官僚與臺灣經濟發展的關係，則有杜麗英的碩士論文「李國鼎與臺灣產業經濟」¹³ 可參考。

專賣制度是臺灣歷代政府的代表性經濟措施之一，向來是經濟政策研究的焦點。范雅鈞〈戰後初期臺灣省菸酒公賣局的制度沿革與財政貢獻〉，¹⁴ 即以戰後菸酒專賣制度為主題，指出戰後初期專賣局生產業務均處於克

-
- 6 翁嘉禧，《二二八事件與臺灣經濟發展》（臺北：巨流出版社，2007）；翁嘉禧，〈二二八事件後臺灣經濟政策與組織的調整〉，《人力資源研究學報》1（2007.6）：76-91，則為專書的第九章。
- 7 翁嘉禧，〈二二八事件時期臺灣經濟政策的特質及其影響〉，收入高雄市文獻委員會編，《紀念二二八事件 60 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2007），頁 117-149。
- 8 吳聰敏，〈臺灣戰後的惡性物價膨脹（1945-1950）〉，收入薛月順編，《臺灣 1950-1960 年代的歷史省思：第八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07），頁 639-661；吳聰敏，〈臺灣戰後的惡性物價膨脹〉，收入梁國樹編，《臺灣經濟發展論文集：紀念華嚴教授專輯》（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94），頁 141-181；吳聰敏，〈1945-1949 國民政府對臺灣的經濟政策〉，《經濟論文叢刊》25: 4（1997）：521-554。
- 9 張清溪，〈臺灣黨國資本主義的興起〉，收入薛月順編，《臺灣 1950-1960 年代的歷史省思：第八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頁 627-638。
- 10 張清溪，〈戰後臺灣的經濟發展〉，《教育資料與研究》專刊（2007.12）：31-48。
- 11 瞿宛文，〈臺灣戰後經濟發展與民主運動〉，《臺灣社會研究》65（2007.3）：183-189。
- 12 瞿宛文，〈戰後臺灣經濟成長原因之回顧：論殖民統治之影響與其他〉，《臺灣社會研究》65（2007.3）：1-33。
- 13 杜麗英，「李國鼎與臺灣產業經濟」（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 14 范雅鈞，〈戰後初期臺灣省菸酒公賣局的制度沿革與財政貢獻（1945-1957）〉，《檔案季刊》6: 4（2007.12）：34-49。

二、土地開發史

難增產階段，直至 1958 年才得以增添設備、開發新產品，邁入新階段。專賣收益則佔全國和省府財政相當大比例，對於經濟發展和政治安定有一定之貢獻。至於戰後臺灣金融體制問題，則有李為楨的博士論文「戰後臺灣金融システムの近代化に関する研究」（戰後臺灣金融體系近代化的研究）¹⁵ 可參考。

此外，過去較少從區域政治經濟發展史面向來討論。林玉茹《殖民地的邊區：東臺灣的政治經濟發展》一書，¹⁶ 嘗試討論臺灣東部做為殖民地邊區的歷史過程。該書收錄作者發表於各期刊雜誌中 9 篇有關東臺灣研究的論文，區分成國家與東臺灣、清賦與東臺灣、殖民與產業以及史料與史學四部分。該書主要透過國家對東部行政空間的規劃、賦稅制度的施行、漁業移民的移入以及近代化企業的改造等實證研究，論證不同形態的國家治理對於東部政治經濟發展上的影響。特別著力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殖民帝國如何面對殖民地的邊區，亦即如何制定位於政治、經濟版圖邊緣的東臺灣的發展策略及其演變。

整體而言，2007 年經濟政策史研究，出現張清溪與瞿宛文有關黨國資本主義的不同看法。儘管如此，國家機器顯然是影響戰後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歷史學至今卻鮮少注意這個課題。其次，臺灣經濟現象的區域差異頗為明顯，區域經濟的發展是未來可以進一步比較討論的課題。

2007 年有關臺灣土地關係與區域開發的研究，共 15 篇。研究的主題，包含熟番地權、地區開發、土地租佃、土地放領、土地接收、土地改革以及市街發展等課題。研究的時間斷限，則以清代地區開發和戰後土地改革相關討論居多。

熟番地權和地區開發一直是清代臺灣土地史研究的主要課題，2007 年仍有持續的進展。李文良〈清代臺灣岸裡社熟番的地權主張：以大甲溪南墾地為例〉一文，¹⁷ 指出即使像岸裡社那樣強大的番社，且有政府依據法律准許熟番開墾土地來為其背書，熟番仍然難以維持地權。他們還是需要透過一些文化建構，來強化地權以及土地控制的合法性基礎。地區開發史成果更為豐碩，主要是學位論文，共 6 篇，研究區域包括：濁水溪中游、牛稠河流域、清水地區、日月潭地區、宜蘭溪南地區及南臺灣的山區。¹⁸ 顯然，就研究區域而言，中部地區最受矚目，時間斷限則仍以清代為主。

日治時期土地地權的討論，比較偏重於緣故關係地和土地放領。張怡敏〈日治時代霧峰林澄堂緣故關係地所有權之取得試析〉，¹⁹ 就以臺灣中部大地主霧峰林家頂厝林澄堂為個案，利用家族帳簿資料等私文書，探討其長達二、三十年取得緣故關係地所有權的過程。再從政策面來看，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的土地政策，不僅關係地權的變動，也可能演變成政治社會運動。劉淑玲《臺灣總督府的土地放領政策：以日籍退職官員事件為例》，是第一本處理此課題的專書。²⁰ 該書是其碩士論文修改

15 李為楨，「戰後臺灣金融システムの近代化に関する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大学院経済学研究科博士論文，2006）。

16 林玉茹，《殖民地的邊區：東臺灣的政治經濟發展》（臺北：遠流出版社，2007）。

17 李文良，〈清代臺灣岸裡社熟番的地權主張：以大甲溪南墾地為例〉，收入王泰升、劉恆奴編，《以臺灣為主體的法律史研究》（臺北：元照出版社，2007），頁 135-162。

18 這些論文是：張永楨，「清代濁水溪中游的開發」（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2006）、黃阿有，「日治前牛稠河流域發展之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2006）、舒坤停，「清代清水地區的開發」（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7）、王和安，「日治時期南臺灣的山區開發與人口結構：以甲仙六龜為例」（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張琬鈴，「清代宜蘭溪南地區漢人拓墾勢力與地方社會（1804-189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7）、林俐均，「日本統治時期日月潭的開發」（臺北：中國文化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19 張怡敏，〈日治時代霧峰林澄堂緣故關係地所有權之取得試析〉，《臺灣史研究》14: 3（2007.9）：73-96。

20 劉淑玲，《臺灣總督府的土地放領政策：以日籍退職官員事件為例》（臺北：常春樹出版社，2007）。

出版，乃以 1925 年日籍退職官員事件為例，探討殖民政府對日本人放領國有地的政策及衍發的問題。該書認為總督府對濫墾地的認定及法令的援引，並無一貫的立場，遂引起緣故地農民的強烈抗爭，也使得對日籍退職官員的土地放領與預期目標相差甚遠。而總督府放領土地給日籍退職官員的動機，是爲了安撫在臺日人的不滿情緒，補救農業移民之失敗，進而培植在臺的政黨（憲政會）勢力。最終目標則是促使退職官員在臺定居，深入臺灣農村，以發揮「內臺融合」及「同化」之功用。其政治意義大於經濟意義。

戰後新舊政權交接之際，人民權利最容易受到影響，地權亦不例外。何鳳嬌的〈戰後初期臺灣土地接收的糾紛〉，²¹ 即探討戰後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灣後，完全未考慮被統治者的立場，加上法體系不同，或是政令施行不周全，導致種種糾紛，甚至個人私有土地被收爲公有。這些臺灣人私有土地與接收自日本人的龐大公有地，成爲日後政府實施土地改革的土地來源。

土地改革是戰後中華民國政府在臺灣施行的第一個經濟政策，且被認爲是稀有的成功案例，向來備受重視。不過，過去研究的重點大多集中在土地改革政策及其成效，且持肯定態度者居多。近年來漸有不同的聲音出現，開始質疑政府實施的動機及其成效是否真如其所宣傳的那般。首先，戰後政府宣稱臺灣需要進行土地改革，是基於日治以來租佃制度有諸多問題，又剝削佃農過度，導致佃農沒有能力也缺乏意願進行土地改良及從事集約式的農場經營。葉淑貞〈日治時代臺灣佃耕地租期長短之訂定〉一文，²² 則有不同的看法。該文延續葉氏過去系列的研究，指出日治時期租期的長短並未影響佃耕農場的經營決策與效率。租期在 1930 年代中期以後已有延長的趨勢，且逐漸以書面租約爲準。亦即日治時代租佃制度在租期的安排上符合效率原則，並不像戰

後政府所言，日治以來的租佃制度是土地制度的萬惡淵藪。劉瑞華〈土地改革與政府收入〉，²³ 則從財政面著手，指出國民政府爲因應不同時間、不同程度的財政與政治需要，調整土地改革的施行方式。亦即，最初撤退到臺灣時，政府先實施三七五減租，作爲贏取廣大農村政治支持和推行加稅的權宜策略。之後，當韓戰帶來美援紓解財政需求後，政府開始著手改進農村制度，並利用土地改革增加長期收入，而成功地抗拒了地主對政治的影響及取代其在農村社會裡的角色。此外，土地改革相關的碩士論文有：余美滿「臺灣土地改革政策之政治經濟分析，1945-1953」。²⁴

2007 年在戰後土地改革的研究上有新的突破。然而，歷史是有延續性的，要了解戰後臺灣歷史變革，不能祇從戰後談起。戰後臺灣土地改革能夠成功，除了時空環境的配合，政治、經濟及社會等種種因素的促成外，政府擁有龐大的公地，得以先行實施公地放租、放領，而對三七五減租及耕者有其田、扶植自耕農等都有重大的示範作用。所以跨政權的土地史研究應是日後必須加強的面向。其次，二次世界大戰後，爲防堵共產主義的蔓延，在美國的協助下，非共國家陸續展開土地改革，臺灣只是其中之一。因此，進行土地改革的國際比較，特別是與舊殖民地的比較，應該是值得發展的課題；另一方面，民眾對於土地改革的因應，也是過去較少注意的面向。

三、移民史

2007 年移民史的研究成果共 4 篇，主要集中在日治時期，仍以日本移民爲焦點。首先，長期投入日治時期日本移民史研究的張素芬，繼續從煙草栽培與移民村社會經濟變遷的關係著手，探討該地的農業經營問題。〈河

21 何鳳嬌，〈戰後初期臺灣土地接收的糾紛：以更改日式姓名的臺人遭遇為例〉，《國史館學術集刊》13（2007.9）：123-154。

22 葉淑貞，〈日治時代臺灣佃耕地租期長短之訂定〉，《臺灣史研究》14: 1（2007.3）：139-190。

23 劉瑞華，〈土地改革與政府收入〉，收入薛月順編，《臺灣 1950-1960 年代的歷史省思：第八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頁 597-626。

24 余美滿，「臺灣土地改革政策之政治經濟分析，1945-1953」（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碩士論文，2006）。

床上的黃金夢：臺灣南部菸草移民村的農業經營》，²⁵指出位於下淡水溪浮覆地的日本移民村，以菸草栽培為主，既是臺灣各移民村最具特色者，也是1930年代專賣局積極推行種菸草的具體成果。南部移民村由於總督府殖產局與專賣局的雙重輔導，再加上菸草的製作性質，保障了菸草的產值與產量，使其成為全臺移民村經濟狀況最佳之地，更是臺灣最重要的菸產區。

陳鴻圖〈農業環境與移民事業：臺東廳下私營移民村的比較〉，²⁶以農業環境與移民事業為主題，以臺東製糖株式會社的四個移民村為研究對象，闡明臺東的自然條件在移民事業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各個移民村的成效差異。本文指出貧窮的農業經濟和侷限的農業環境，是導致臺東廳私營移民失敗的主要原因。

日治至戰後時期，臺灣農業與人才的海外輸出是一個重要的課題。但是，研究成果有限。張靜宜〈「鋤頭戰士」之南進：日治後期臺灣農業人才之輸出〉，²⁷探討1938年起，在臺灣總督府的規劃下，派遣農業人才，將臺灣熱帶栽培經驗移植到中國華南、東南亞佔領地，協助軍方發展各地農業，以支援各項軍需作物的增產。不過，由於史料侷限，該文僅能就外部樣態探討，至於農業技術人才輸出與當地人群互動、農業環境改造、人與作物的在地適應等問題，仍待進一步討論。

東部客家移民是新近特別被注意的研究方向。廖經廷〈鳳林地區日治與戰後客家移民之比較研究〉一文，²⁸主要比較日治和戰後移民至鳳林地區客家人的遷移模式，並從職業、客家意象、社團活動以及原鄉聯繫等四方面分析其在地化過程的異同。

整體而言，臺灣有關日本移民的研究，從1996年開始穩定成長，研究對象從單一移民村、區域性移民村到全臺移民村；移民職業從農業到漁業；探討主題從經濟、社會、建築古蹟到文化與文學；研究視野則從微觀

到宏觀。未來在官營和私營移民的比較、日本帝國圈的農業移民比較，都是可再發展的空間。另一方面，從長時期觀察不同族群或不同業別的移民現象，或是戰後來臺的新移民以及幾次大規模的海外移民潮等課題，仍有廣大研究空間。

四、水利史

水利史在臺灣經濟史研究中一直受到關注。2007年相關論文有7篇。依研究時間斷限來看，清代1篇、日治時期4篇、戰後1篇、跨時期1篇。日治時期的水利問題，顯然是近來水利史研究的重心。依研究區域來看，主要集中於中部地區，且都和烏溪流域有關。依研究課題而言，主要包括治水、水利與農業、水圳開鑿以及水利組織等課題。

治水是近年來水利史新興的課題。馬鉅強〈烏溪治水事業之研究：以《灌園先生日記》為中心〉，²⁹以霧峰林家林獻堂日記為中心，探討日治時期烏溪治水工程及林獻堂所扮演的角色。該文指出烏溪治水除了保護既有的水圳外，也帶來土地增值、河川浮覆地開發以及解決部分失業人口等效益。由於霧峰林家位於烏溪河畔，水患的有無與治水工事的完備對其影響甚鉅，因此作為大家長的林獻堂在治水事業的籌劃、動工、與官方交涉等方面均扮演重要角色。另一方面，總督府也藉治水來約束林獻堂在非武裝抗日中的活動。

水利組織與地方社會的關係，向來受注意。劉素芬〈日治時期霧峰水利組織與地域社會的演變〉，³⁰也以《灌園先生日記》為中心，分析霧峰林家在林獻堂的領導下，配合祭祀公業雄厚的經濟基礎，在水利事業上和國家展開既合作又競爭的關係。該文指出1908年阿罩霧圳公共化的過程，啟發林家將祭祀公業予以財團法

25 張素芬，〈河床上的黃金夢：臺灣南部菸草移民村的農業經營〉，《人文資源研究學報》1（2007.6）：13-34。

26 陳鴻圖，〈農業環境與移民事業：臺東廳下私營移民村的比較〉，《兩岸發展史研究》4（2007.12）：35-80。

27 張靜宜，〈「鋤頭戰士」之南進：日治後期臺灣農業人才之輸出〉，《高苑學報》13（2007.7）：387-410。

28 廖經廷，〈鳳林地區日治與戰後客家移民之比較研究〉，《客家研究》2：1（2007.6）：127-172。

29 馬鉅強，〈烏溪治水事業之研究：以《灌園先生日記》為中心〉，《臺灣文獻》58：1（2007.3）：245-288。

30 劉素芬，〈日治時期霧峰水利組織與地域社會的演變〉，《國立中央大學人文學報》31（2007.7）：145-180。

人化之機。企業化的公司組合模式成爲日治時期霧峰地區社會組織演變的基本架構，對祭祀公業、業佃關係、水利組織及地方基層行政均有重大影響，是維護地域社會利益的有力工具。陳鴻圖則關注戰後水利會的問題。〈「農業振興」と「營利主義」の狭間：終戦後臺灣における嘉南農田水利会の発展〉（農業振興與營利主義之間：戰後臺灣嘉南農田水利會的發展）一文，³¹ 觀察嘉南農田水利會組織的變遷過程，指出水利組織是從清代的民間自主經營，日治時期的半官半民，到戰後則逐漸官營化。其變遷的原動力在於水功能的逐漸轉變，不論民間或政府都急欲掌握水資源，而導致水利組織爲求生存不斷在政府和農民間斡旋，甚至被強迫轉型。

黃繁光〈霧峰地區的水圳發展與農作生產〉，³² 從長時期觀察霧峰地區的水圳系統和農作發展的關係。該文指出自乾隆年間的萬斗六圳興建開始，霧峰地區的水圳逐漸延伸，發展出霧峰西部平原水利系統，灌溉田地超過千甲。1930年代，進行烏溪整治工程，完成現代化技術的堤防及阿罩霧圳水利組合的運作，排除用水糾紛，大幅增加灌溉耕地。戰後霧峰發達的水利系統和南投水利會的經營管理下，促使本區農業高度發展，「霧峰香米」應運而生。此外，水利與產業的關係又有陳燕釗的〈日據時期水利設施開發與糖業發展關連性研究〉和〈日據時代以前土地拓墾及水利開發與臺灣糖業發展關連性研究〉可參看。³³

清代水圳的興築，則有陳哲三的〈清代南投縣境的水圳開鑿官府與民間所扮演的角色〉，³⁴ 認爲官方對於水利設施乃採取消極態度，而鼓勵民間興建。不過，這個說法似乎忽略區域差異的事實，臺灣其他地區仍有知縣積極參與水圳興築的例子存在。

整體而言，過去臺灣水利史研究較偏重水利組織、

水利開發、水利支配、對區域社會經濟的影響，以及水利與環境互動等五個面向。就2007年的相關研究來看，有三個方向仍待努力。首先，是區域的比較研究。就烏溪流域的水利發展來說，《灌園先生日記》無疑是最重要的史料之一，但由於林獻堂是全臺性指標人物，因此霧峰地區的水利發展和其他地區是否一致？還是總督府特別「禮遇」的產物？要解決此問題，比較研究應是將來可以努力之處。其次，治水工程和水利事業對土地的影響，是值得探討的課題。日治時期有九大河川的調查及陸續展開的治水事業，目前淡水河、烏溪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其他河川的變遷史、人和河川的互動過程、堤防與土地改良、河川地利用等，都是亟待解決的課題。最後，就農田水利會而言，1945年前後水利會接收和復員、1950年代美援和農村水利運作的關係以及水利會派系等課題，仍值得進一步討論。

五、交通史

戰後長期以來，交通史的研究成果不多，近年始漸受關注。2007年共有論文14篇，是豐收的一年。就研究斷限而言，日治時期有12篇、戰後2篇，清代的研究則付之闕如。由此可見，臺灣交通史的研究重心與焦點在日治時期。就研究主題來看，日治時期的研究包含國有鐵路、輕便鐵路、道路、航運、郵政、運送業、電力以及電話等課題；戰後的研究有鐵路、海運事業以及資訊電子產業等課題。

過去日治時期的交通史研究大多著眼於基礎工程（infrastructure），近來已漸重視各事業中的從業人員和技術官僚的角色。蔡龍保和吳政憲在此課題著力甚多。蔡龍保〈殖民地における技術移転——臺灣總督府鉄道

31 陳鴻圖著，湊照宏譯，〈「農業振興」と「營利主義」の狭間：終戦後臺灣における嘉南農田水利会の発展〉，《社会システム研究》15（2007.9）：131-156。

32 黃繁光，〈霧峰地區的水圳發展與農作生產〉，《淡江史學》18（2007.9）：151-192。

33 陳燕釗，〈日據時期水利設施開發與糖業發展關連性研究〉，《工商學報》12（2007.6）：58-71；陳燕釗，〈日據時代以前土地拓墾及水利開發與臺灣糖業發展關連性研究〉，《經科學報》2：2（2007.8）：32-52。

34 陳哲三，〈清代南投縣境的水圳開鑿官府與民間所扮演的角色〉，《逢甲人文社會學報》15（2007.12）：105-141。

部員の育成を事例として) (殖民地技術の移轉：以臺灣總督府鐵道部職員的養成爲例) 一文，³⁵ 比較日本、臺灣、朝鮮的鐵路人才養成方式，指出臺灣人職員具鐵路專業知識者甚少，殖民地時期技術轉移成效又不彰，使得戰後初期國民政府接收困難，不得不留用日籍技術人員。又有〈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之技術官僚：以土木技師爲例〉一文，³⁶ 以職司道路事業的土木技師爲對象，分析其出身、素質、任務職掌、流動之長期變化，以及土木技術官僚與日本國策和總督府殖民政策之密切關係，並由戰後國民政府接收之困窘，解析殖民地技術轉移之不良。吳政憲〈近代臺灣資訊社會的電話接線生(1900-1930)：以臺北局爲中心的探討〉一文，³⁷ 究明電話接線生這門新職業的發展，觀察從業性別的變化、待遇與升遷概況、服務品質、資訊流量，及其在 1920 年代末期遭遇自動交換機衝擊後之肆變，以一窺臺灣資訊社會之一端。

輕便鐵路、運輸倉庫業、道路事業的相關研究，是 2007 年來較新的課題。蔡龍保〈日本殖民地下的臺灣人企業：以桃崁輕便鐵道會社爲例〉一文，³⁸ 指出 1900 年代在臺灣總督府獎掖下，全臺興起鋪設輕便鐵路之風潮。桃崁輕便鐵道會社的個案研究，展現日本殖民時期臺灣人勇於挑戰新產業、臺灣人資本的存續與發展，以及地方領導階層由士紳、地主、資產家轉爲企業家的現象。陳家豪的碩士論文「日治時期桃園輕鐵的經營與發

展，1903-1945」，³⁹ 則以桃園輕鐵爲例，觀察臺人企業在日治時期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經營實況以及在社會經濟上的角色。王珊珊〈日治時代小運送業與臺灣倉庫株式會社〉一文，⁴⁰ 以日治時期的「小運送業」爲對象，究明其發展過程、「運送業組合」以及臺灣倉庫株式會社與統治者之關係。蔡龍保〈日治時期臺灣近代鋪設道路的演進及其發展〉一文，⁴¹ 探討臺灣近代道路鋪設之緣起、推廣及成果，並闡明傳統道路如何變身爲近代道路。該文指出臺灣近代道路的鋪設乃配合汽車運輸業之需求，爲總督府鐵路、港灣、汽車運輸的交通整合政策奠定初步的基礎。

日治時期臺灣電力與工業化問題爲學界持續關心之焦點。吳政憲就市場、發電量、工業化等面向，發表其博士論文的研究成果。〈日治時期臺灣電力市場成長動力分析(1920-1938)〉一文，⁴² 利用《營業報告書》，以「資產報酬率」、「營業利益率」、「淨利成長率」、「總資產成長率」、「總資產週轉率」等爲指標，指出臺電在「規模經濟」的迷思下造成營運成績不佳。〈「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發電量之研究(1920-1939)〉一文，⁴³ 指出臺電在 1931 年以前，北、中、南三個電力系統無法相互支援，加上「日月潭水力發電計畫」延宕多年，無法滿足市場需求，又設置利用率偏低的火力機組使得成本提高、獲利率降低，導致難以調降費率。〈「臺灣電力株式會社」在臺灣工業化之侷限(1919-1940)〉一文，⁴⁴ 指出臺電由

35 蔡龍保，〈殖民地における技術移轉——臺灣總督府鐵道部員の育成を事例として〉，《アジアの經濟發展における企業活動と金融市場の役割：歴史と現在》(大阪：大阪産業大学アジア共同体研究センタ，2007)，頁 27-48。

36 蔡龍保，〈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之技術官僚：以土木技師爲例〉，《興大歷史學報》19 (2007.11)：309-390。

37 吳政憲，〈近代臺灣資訊社會的電話接線生(1900-1930)：以臺北局爲中心的探討〉，《興大歷史學報》19 (2007.11)：391-444。

38 蔡龍保，〈日本殖民地下的臺灣人企業：以桃崁輕便鐵道會社爲例〉，《國史館學術集刊》11 (2007.3)：1-46。

39 陳家豪，「日治時期桃園輕鐵的經營與發展，1903-1945」(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40 王珊珊，〈日治時代小運送業與臺灣倉庫株式會社〉，《臺灣風物》57: 1 (2007.3)：125-142。

41 蔡龍保，〈日治時期臺灣近代鋪設道路的演進及其發展〉，《第二屆白沙歷史地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2007)，頁 10-1-26。

42 吳政憲，〈日治時期臺灣電力市場成長動力分析(1920-1938)〉，《興大人文學報》38 (2007.3)：253-289。

43 吳政憲，〈「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發電量之研究(1920-1939)〉，《興大人文學報》39 (2007.9)：329-366。

44 吳政憲，〈「臺灣電力株式會社」在臺灣工業化之侷限(1919-1940)〉，《興大歷史學報》18 (2007.6)：269-290。

於「日月潭水力發電計畫」的延宕，無法如期配合臺灣工業發展，造成在農村電氣化、糖業、重油發電部門發展的瓶頸；另一方面，隨著區位條件的變化，臺灣低廉電價對資本家的吸引力已落後於朝鮮、中國東北，因而對內、對外均造成臺灣工業化之侷限和阻礙。此外，戰後交通史的研究偏少，且以鐵路為主題，僅有莊建華的碩士論文「戰後初期臺灣鐵路事業之研究（1945-1947）」可參考。⁴⁵

整體而言，2007年交通史研究不僅在數量上有增加之趨勢，品質亦有所提升，同時又開闢出新課題，成績頗佳。這是由於新史料的整理、開放，因而能有突破。不過，仍有許多課題尚待研究。諸如日治時期的私鐵、輕便軌道、汽車運輸業、郵政、築港及空運等仍有相當大的研究空間，特別是日治時期興起的空運業，至今幾乎空白。交通與社會、文化、地區開發及產業發展的關係等課題，亦亟待進一步研究。戰後交通史研究更是一片處女地，除了其他交通部門之接收和重建仍有發展空間外，美援與交通發展、十大建設中的交通建設、現代資訊電子產業等皆屬重要課題，是未來值得發展的方向。

六、產業史

2007年產業史研究成果眾多，共25篇。依時代來看，荷治時期2篇、清代3篇、日治時期10篇、戰後8篇以及跨時期2篇。日治時期和戰後產業史是研究的重心。依主題而言，包括農業、漁業、物產、報業、觀光業以及產業組織等課題。

早期農業史的研究，近來較受重視。曾品滄〈物競與人擇：荷治與明鄭時期臺灣的農業發展與環境改造〉

一文，⁴⁶重新檢視早期臺灣的農業發展經驗，並論述荷蘭和鄭氏時期的農業特徵及其差異。該文指出明鄭推行的漢人小農生產模式，比起荷人以貿易利益為標的而招徠漢人從事計畫性的農業墾殖活動，更容易獲得成功。另一方面，以生態變遷的觀點來看，兩政權的拓墾活動，其實是一生態環境改造過程，亦即將原住民之燒墾農業，改造成集約栽培的農業生態。其所採取的農業策略，則分別代表西方與東方的殖民地農業經驗，對新墾地的農業改造方式有著明顯差異。陳立人〈荷據時期臺灣赤崁一帶漢人米作稅賦與農業發展之激勵措施〉，⁴⁷則討論荷治時期臺灣漢人的佃作稅賦。該文指出漢佃與漢人墾主之間的租佃關係，基本上是依照原鄉的習慣而構成，漢佃實際的田租負擔約每甲14石。

清代臺灣農業史研究不但數量少，成果亦未見突破。食鹽產業研究是2007年度的重點，共4篇。原來盛行的稻米、茶、蔗糖、樟腦等議題，皆無新作，顯見其研究熱潮似有退去的現象。陳鳳虹〈清代臺灣食鹽的生產〉，⁴⁸說明臺灣西南沿海成為主要產鹽地的原因、臺灣鹽埕的變化以及食鹽生產的方式。鄭博文的碩士論文「清代臺灣鹽專賣制的建立與發展」，⁴⁹則對清代臺灣的鹽專賣制度演變過程，闡述甚詳。近年來，日治至戰後鹽業檔案的蒐集，有助於鹽業史研究的展開。這方面的成果，有顏義芳〈臺灣鹽業發展初探〉和方俊育〈戰後初期的「鹽賊」現象〉可以參考。⁵⁰不過，目前為止，臺灣產業史最龐大而完整的鹽業檔案，似乎仍未被好好地利用。

日治時期，蘆葦加工曾盛極一時，同時也成各方爭競之利源。洪麗雯即以臺灣蘆葦產業為主題，完成碩士論文「殖民主義與產業形塑：日治時期臺灣蘆葦產業的發展」。之後，並發表〈日治時期臺灣蘆葦紙會社的

45 莊建華，「戰後初期臺灣鐵路事業之研究（1945-1947）」（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46 曾品滄，〈物競與人擇：荷治與明鄭時期臺灣的農業發展與環境改造〉，《國史館學術集刊》14（2007.12）：1-37。

47 陳立人，〈荷據時期臺灣赤崁一帶漢人米作稅賦與農業發展之激勵措施〉，《臺南文化》61（2007.2）：1-26。

48 陳鳳虹，〈清代臺灣食鹽的生產〉，《史匯》11（2007.9）：1-28。

49 鄭博文，「清代臺灣鹽專賣制的建立與發展」（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6）。

50 顏義芳，〈臺灣鹽業發展初探〉，《檔案季刊》6: 4（2007.12）：1-15；方俊育〈戰後初期的「鹽賊」現象〉，《檔案季刊》6: 4（2007.12）：50-62。

出現及發展)、〈藝術與產業的交會：清末臺灣蓮草之運銷〉兩文。⁵¹ 其指出清代蓮草透過蓮草畫的形式及原料外銷，將臺灣蓮草推展到世界舞臺。同時以幾個近代化會社經營傳統蓮草加工為焦點，分析其經營權、職工、原料的競爭，以及生產技術機械化和市場等問題。此外，糖業和茶業研究仍是日治產業史被重視的議題，前者有劉書彥，〈新渡戶稻造の臺灣糖業政策と植民思想の展開〉（新渡戶稻造の臺灣政策與殖民思想的展開）一文；⁵² 後者有兩篇碩士論文：陳思萍之「臺灣日治時期近山茶工場研究」、黃馨儀「日治時期臺灣紅茶文化研究：以三井合名會社為例」。⁵³

目前為止，戰後臺灣農業發展已經有不少論述，但各地區發展趨勢是否與總體趨勢一致，是值得討論的問題。曾鼎甲《戰後臺中縣的農業發展（1950-1999）》一書，⁵⁴ 以豐富的統計資料為基礎，分成地理環境與人文背景、農業人口與耕地、農業生產以及農業投入與農業生產力五部分，討論戰後臺中縣的農業發展歷經復甦、穩定成長、衰退的變動過程。該書指出臺中縣農業衰退的時間點，較總趨勢延遲十年，直至 1980 年代才明顯衰退。其原因是 1970 年代，臺中縣農村勞動力的流失現象並不明顯，加以作物栽培面積衰減幅度大於勞動力衰減幅度，以致於仍維持勞動集約投入的農業生產模式。本書屬總體與個體對照的計量史學研究，值得肯定。此外，張孟秋〈戰後臺中市的產業發展（1947-2004）〉一文，⁵⁵ 另闢蹊徑，從地區產業發展的角度著手。

新聞業和觀光業也有新成果。許旭輝〈戰後初期臺灣報業的接收與資源分配〉，⁵⁶ 運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探討其接收臺灣新報的過程與意義。該文指出戰後臺灣媒體事業得以迅速發展，立足於戰前遺留的設備和人才。不過，日治末期戰時體制下所整合的報業資源，戰後轉由長官公署繼承，而造就戰後初期臺灣報業市場由官營報系獨大之局勢，影響往後數十年臺灣報業之發展。另一方面，戰後臺灣報社接收與分配的過程，也是一部黨部與行政長官公署等官方勢力在媒體場域中角逐的歷史。相關研究，還有許氏的碩士論文「戰後初期臺灣報業之發展：以《臺灣新生報》為例」，⁵⁷ 可以參考。旅行觀光產業的研究至今甚少，是一個亟待開發的領域，僅有吳怡靜的碩士論文「日治時期高雄市的觀光發展研究：以交通與旅館為主」⁵⁸ 可參考。

2007 年在產業組織上出現新議題，主要集中於日治時期水產組織的討論。謝佳珍〈臺灣水產協會成立初探〉一文，⁵⁹ 分析日治時期臺灣水產協會的成立背景及其幹部組成。該文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因日本本地水產罐頭需求增加，而帶動臺灣水產業的發展。由於臺灣缺乏協調各地水產團體的單位，乃由總督府官員與臺灣水產株式會社發起，成立臺灣水產協會。然因該會會員有限，使其決策僅能向上傳達，卻無法直接向下推動執行，是其侷限。謝氏又有〈臺灣水產會成立初探〉，⁶⁰ 闡明臺灣水產會的成立背景、合併水產協會的過程以及臺灣水產會和水產協會的差異。

51 洪麗雯，「殖民主義與產業形塑：日治時期臺灣蓮草產業的發展」（臺南：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日治時期臺灣蓮草紙會社的出現及發展〉，《臺灣文獻》58: 4 (2007.12): 269-312、〈藝術與產業的交會：清末臺灣蓮草之運銷〉，《臺灣學研究》4 (2007.12): 61-76。

52 劉書彥，〈新渡戶稻造の臺灣糖業政策と植民思想の展開〉，《アジア文化研究》14 (2007.6): 63-75。

53 陳思萍，「臺灣日治時期近山茶工場研究」（臺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古蹟保存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黃馨儀，「日治時期臺灣紅茶文化研究：以三井合名會社為例」（臺北：國立臺北大學民俗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54 曾鼎甲，《戰後臺中縣的農業發展（1950-1999）》（臺北：稻鄉出版社，2007）。

55 張孟秋，「戰後臺中市的產業發展（1947-2004）」（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6）。

56 許旭輝，〈戰後初期臺灣報業的接收與資源分配〉，《臺灣風物》57: 3 (2007.9): 133-184。

57 許旭輝，「戰後初期臺灣報業之發展：以《臺灣新生報》為例」（臺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社會教育系碩士論文，2007）。

58 吳怡靜，「日治時期高雄市的觀光發展研究：以交通與旅館為主」（高雄：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59 謝佳珍，〈臺灣水產協會成立初探〉，《臺北文獻》160 (2007.6): 123-146。

60 謝佳珍，〈臺灣水產會成立初探：兼論其與臺灣水產協會的差異〉，《臺灣風物》57: 4 (2007.12): 145-178。

整體而言，從數量來看，產業史是目前臺灣經濟史研究最熱門的領域，2007年更展開一些新課題，有些可喜成果。然而，就研究品質而言，嚴謹而有新論的學術性著作稍嫌不足，尚待提升。特別是部分主題流於瑣碎，或是史料的運用仍待加強。如何透過紮實的史實重建，提出有意義的論述，是產業史研究未來必須面臨的問題。

七、工業科技史

2007年臺灣工業科技史的專論有14篇，主題涵蓋礦業、農產加工、造船、金屬、機械等各項產業。其中，尤以造船業研究成果最為豐碩。以時間斷限來看，跨時期2篇，清代1篇，日治時期3篇，8篇則是戰後工業史。顯然，戰後工業史已成爲重點。

礦業史研究向來不多。2007年，難得有論文出現。黃俊銘、劉彥良及黃玉雨等〈清代苗栗出礦坑石油開礦史〉，⁶¹爲第一篇討論清代苗栗石油礦開採史的專文。該文主要從民間與洋商爭奪開採權、清廷對於礦坑資源的態度以及官辦採礦等面向切入，指出因礦務向由承辦官員負擔成敗損失，導致其對開礦持保守態度，又因利益和主權問題排拒洋商，終因缺乏開採技術和經營能力而告失敗。

日治時期長期以米糖經濟發展爲主軸。以糖業爲主的食品加工業，成爲當時臺灣工業的龍頭，向來是研究的焦點。鳳梨罐頭業的研究，則是近來新課題。高淑媛《經濟政策與產業發展：以日治時期臺灣鳳梨罐頭業爲例》一書，⁶²集結作者過去相關研究，重新由經濟政策與產業發展的角度，觀察日治時期殖民政策與鳳梨罐頭業發展之間的關係。該書指出，由鳳梨產業的發展來看，臺灣仍受到世界經濟環境和思潮變化的影響，殖民地的特殊性並不強烈。臺灣經濟政策的殖民地特殊性

格，主要表現在以模仿爲主來制訂政策，以及實施過程中國家權力的強制性與差別待遇的層面上。另一方面，農民與業者在面臨國家政策變化時，也有一定的自主性。高書的立論提供一個新的觀點，但鳳梨罐頭業是否具有代表性，仍待與其他產業作進一步比較。至於戰後食品加工業的研究，尚有開闢空間，僅有陳敏媛〈產銷計畫下的臺灣洋菇罐頭業（1961-1990）〉可參考。⁶³

臺灣造船業史是近幾年來新興的課題，2007年從日治至戰後、從單一會社到地區性造船業、從公營公司到私營民船廠，均有成果。特別是對日治時期臺灣造船業的生成、戰後接收轉換期下的臺灣造船公司、1950年代臺灣造船業與航運界的關連、1960年代以後臺灣造船公司的技術引進，以及高雄旗津造船業的發展，大致已予釐清。

日治時期工業化與造船業關係的討論，有蕭明禮〈日本統治時期における臺灣工業化と造船業の発展〉（日治時期臺灣工業化與造船業的發展）一文，⁶⁴概述日治時期臺灣造船業的形成與發展。該文指出現代臺灣造船事業乃伴隨1899年基隆港的興建而出現，最初僅爲便於修理築港用船舶，之後成立會社，1930年代卻被三菱重工收購，改組爲臺灣船渠會社。會社的改組，顯然既是日本南進政策下的產物，也是日本新興資本擴張的結果。

洪紹洋則主要著力於戰後臺灣造船業的研究，特別是以承繼臺灣船渠會社的臺灣造船公司爲研究焦點。在〈戰後初期臺灣造船公司的接收與經營（1945-1950）〉一文中，⁶⁵運用資源委員會與臺灣造船公司內部資料，釐清了日治時期的臺灣船渠株式會社於戰後先後轉爲臺灣機械造船公司和臺灣造船公司的過程，並說明日治時期日本人持有的股票與民股，戰後如何整編爲國省合營的臺灣機械造船公司的資產。該文由人事分析指出，戰後臺船公司的技術可說是來自中國經驗的移植。〈開闢途上

61 黃俊銘、劉彥良、黃玉雨，〈清代苗栗出礦坑石油開礦史〉，《苗栗文獻》42（2007.12）：12-32。

62 高淑媛，《經濟政策與產業發展：以日治時期臺灣鳳梨罐頭業爲例》（臺北：稻鄉出版社，2007）。

63 陳敏媛，「產銷計畫下的臺灣洋菇罐頭業（1961-1990）」（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6）。

64 蕭明禮，〈日本統治時期における臺灣工業化と造船業の発展：基隆ドック会社から臺灣ドック会社への転換と経営の考察〉，《社会システム研究》15（2007.9）：67-86。

65 洪紹洋，〈戰後初期臺灣造船公司的接收與經營（1945-1950）〉，《臺灣史研究》14：3（2007.9）：139-177。

国工業化の条件：1960年代臺灣造船公司における技術移転の例) (開發中國家工業化的條件：以1960年代臺灣造船公司的技術轉移為例)一文，⁶⁶則探討1960年代臺灣尚未正式發展重工業前，公營企業臺灣造船公司如何藉由引進日本技術，並運用「後發利益」學習模式，最後終於擁有建造大型船舶的能力。此外，有關戰後造船業的研究，尚有林本原的碩士論文「國輪國造：戰後臺灣造船業的發展(1945-1978)」。⁶⁷

從長時期觀察一地造船業的論文，有吳初雄〈旗後的造船業(1895-2003)〉。其以臺灣區造船同業公會資料為主，並佐以口述訪談，介紹日治時期至近年高雄旗津地區造船業的發展。⁶⁸不過，造船技術人才的來源，究竟是由公營企業離職員工轉任，或是由傳統造船師傅來傳承技術，仍是未來值得注意的課題。

陳慈玉近來著力於臺灣鋁業的研究。〈「計畫經濟」体制下の臺灣アルミニウム産業〉(計畫經濟體制下的臺灣鋁業)，⁶⁹著重於戰後初期臺灣鋁業公司的復員，並與同時期日本鋁業的復興進行比較。該文指出，臺灣鋁業是1930年代南進政策下的產物。戰後資源委員會接收日本鋁株式會社，成立臺鋁公司。然而，當時中國的工業背景，缺乏煉鋁所需的技術和資金，因此必須引入國外資本，但1950年代前後兩次與美國資本合作計畫卻均告失敗。反觀戰後日本輕金屬株式會社的發展，雖然也有資金和設備的問題，但在順利引進加拿大鋁公司技術後，即為日本鋁業的發展奠定基礎。

塑膠產業在戰後臺灣經濟發展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過去幾乎少為人關注，2007年終於有專文出現。吳若予〈外資與國家資本之相依共存：退輔會塑膠工廠之設立與臺灣聚合化學品公司〉，⁷⁰主要討論臺灣石化工業的先驅臺灣聚合公司與1972年退輔會塑膠工廠成立之間的關係。作者指出美商投資的臺聚公司之所以願意協助退輔會規劃塑膠工廠的設立，主要基於退輔會雄厚的政治關係，以影響政府決策，鞏固臺聚在臺灣塑膠市場的獨佔利益。由此個案再次證明，陳玉璽提出的外資與國家資本之間相依共存關係的存在。

國立科學工藝館近年來展開「臺灣產業史」研究系列，出版幾本工業史相關書籍，分別是：許正和、邱創勳《躍上峰頂的臺灣鐵馬：臺灣自行車產業發展史》，⁷¹從技術史的觀點，敘述臺灣的自行車從日治時期仰賴進口，到戰後自行生產，甚至自立品牌而成為自行車製造王國的過程。楊凱成《足下奇蹟：臺灣製鞋產業發展史》，⁷²主要以口述訪談方式，從科技與生活史的角度，敘述日治至戰後臺灣製鞋業的發展過程。又有林登立《電腦王國在臺灣：臺灣電腦產業發展史》⁷³可參考。碩士論文則有謝芳怡「戰後臺灣『非獨占』公營企業的經營分析：以臺灣省農工企業公司為例(1957-2000年)」一文。⁷⁴

在企業經營方面，趙祐志〈在臺日人菁英之家族觀與企業的繼承(1895-1945)〉，⁷⁵以日治時期在臺日本企業繼承的親屬關係為研究焦點。在作者分析的126個企業中，近四分之一的日本人企業是由養子繼承，且多為股份公司。這種現象與日本國內相近。大致上，在臺的日本企業多採單嗣繼承制度，使得家產能夠集中繼承，

66 洪紹洋，〈開發途上国工業化の条件：1960年代臺灣造船公司における技術移転の例〉，《社会システム研究》15（2007.9）：87-108。

67 林本原，「國輪國造：戰後臺灣造船業的發展(1945-1978)」(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7)。

68 吳初雄，〈旗後的造船業(1895-2003)〉，《高市文獻》20：4（2007.12）：1-52。

69 陳慈玉著，星野多佳子譯，〈「計畫經濟」体制下の臺灣アルミニウム産業〉，《社会システム研究》15（2007.9）：109-130。

70 吳若予，〈外資與國家資本之相依共存：退輔會塑膠工廠之設立與臺灣聚合化學品公司〉，《檔案季刊》6：12（2007.12）：16-28。

71 許正和、邱創勳，《躍上峰頂的臺灣鐵馬：臺灣自行車產業發展史》(高雄：科學工藝博物館，2007)。

72 楊凱成，《足下奇蹟：臺灣製鞋產業發展史》(高雄：科學工藝博物館，2007)。

73 林登立，《電腦王國在臺灣：臺灣電腦產業發展史》(高雄：科學工藝博物館，2007)。

74 謝芳怡，「戰後臺灣『非獨占』公營企業的經營分析：以臺灣省農工企業公司為例(1957-2000年)」(臺北：國立政治大學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75 趙祐志，〈在臺日人菁英之家族觀與企業的繼承(1895-1945)：以126個繼承事例為例〉，《臺北文獻》159（2007.3）：33-89。

其後並逐漸衍生出有血緣關係的本家、分家及無血緣關係的別家所構成的企業集團，形成「同族經營體制」。

大體上，臺灣工業的發展過程乃自日治時期以米糖經濟為主的農業經濟，先帶動食品加工業的發展，至 1930 年代配合日本軍需工業化政策，逐漸朝重工業轉移。但除了少數工場規模較大外，多屬規模較小的家內工業。戰後中華民國政府將較具規模的企業收編為公營企業，建構了規模龐大的公營企業體制。1945 年至 1950 年的政權更替期間，成立許多公營企業。這些企業與日治時期的經營和生產方式相較，勢必有斷裂也有延續。這方面的討論，過去多歸功於資源委員會既建立良好制度，又帶領一批學有專精的工程師來臺灣進行復舊工程，使得公營事業能夠在短期間重建。然而，這樣的論點，有忽視原來臺灣本土培養的技術者之嫌。或許通盤檢討戰後初期臺灣企業的吸收與經營，才能建立更客觀的通說。其次，由政府的產業政策著手，釐清戰後工業發展是如何自輕工業轉移至重工業，是另一個值得注意的課題。再者，由於臺灣屬於後進國家，缺乏先進技術，因此要如何導入先進國的技術進行發展，值得探討關切。有關公營企業臺船和臺鋁公司，在尋求國外技術支援的政策過程及所遭遇的困難，已有所釐清。然而，民營企業如何獲取先進國家技術，乃至於公營和民營企業的技術選擇，是否受到文化或政經等因素影響，則仍待研究。最後，產業研究的細緻化，也是值得思索的問題。以日本為例，會社社史論著眾多，臺灣則仍有許多發揮的空間。

八、貿易史

2007 年臺灣貿易史相關研究共 7 篇。就研究時間斷限而言，從早期至日治時期均有。就主題而言，則包括原住民消費品的輸入網絡、荷蘭時期漢人的投資、清代

的郊與郊商、日治時期的臺滿貿易等課題。其中清代的郊是研究重心，戰後研究則付之闕如。

貿易與原住民文化是本年度的新課題。王淑津、劉益昌〈17 世紀前後臺灣煙草、煙斗與玻璃珠飾的輸入網絡：一個新的交換階段〉一文，⁷⁶ 利用考古資料與西、荷文翻譯史料，論證 17 世紀前後，臺灣因處於貿易要道上，外來的物質文化玻璃珠、瑪瑙、煙斗、喫煙習俗深入影響原住民既有的文化體系。玻璃珠、瑪瑙取代了玉器為主的飾品與儀式用品體系，而煙斗、喫煙習俗也隨著荷人和西班牙人統治臺灣，成為原住民日常生活的消費用品。

陳宏維則關注荷治時期漢人的投資活動。〈荷蘭時代末期臺灣西部漢人投資活動〉一文，⁷⁷ 探討荷人所訂定的各種管理漢人活動制度與漢人投資方式之間的對應關係。該文指出荷治末期臺灣西部漢人的投資活動有朝大資本投資，且海外貿易與內地經營連結強化的趨勢。

郊向來是清代臺灣貿易史研究的焦點。2007 年，由於私文書的發掘，在個別郊商研究上獲得可喜的成果，大致上已經釐清郊商的貿易機制、與大陸和臺灣本地的多元投資關係以及資金的交易模式。林玉茹〈商業網絡與委託貿易制度的形成：19 世紀末鹿港泉郊商人與中國內地的帆船貿易〉，⁷⁸ 以鹿港泉郊許家為例，指出郊商透過購買土地來取得出口商品米穀，並控制進口的日用商品，而同時經營米穀和雜貨買賣。他們也深諳多元投資之道，甚至跨海投資泉州地區的商號。其次，鹿港因是正口，貿易規模較大，更讓泉州、鹿港兩地郊行之間形成彼此互相買賣商品的委託貿易機制。從商品的代辦和代兌、資金交易以及市場資訊的互通，多重而繁複的合夥和合作關係，使兩地郊商形成可以互相信賴的共利結構，進而組成橫跨泉、鹿兩地的商業貿易集團。沈昱廷〈清代郊行研究：以北港資生號為例〉，⁷⁹ 以 19 世紀初北港吳氏家族的郊行資生號為研究對象，闡明笨港郊行的

76 王淑津、劉益昌，〈17 世紀前後臺灣煙草、煙斗與玻璃珠飾的輸入網絡：一個新的交換階段〉，《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22（2007.3）：51-81。

77 陳宏維，〈荷蘭時代末期臺灣西部漢人投資活動〉，《臺灣文獻》58: 4（2007.12）：95-124。

78 林玉茹，〈商業網絡與委託貿易制度的形成：19 世紀末鹿港泉郊商人與中國內地的帆船貿易〉，《新史學》18: 2（2007.6）：61-102。

79 沈昱廷，〈清代郊行研究：以北港資生號為例〉，收入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研究所、臺灣古文書學會編，《臺灣古文書與歷史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逢甲出版社，2007），頁 95-136。

集貨和銷售模式、與洋行的合作型態、放貸、土地經營以及多重投資的現象。由於該文得以利用吳家的帳冊和地契文書，所以更清楚地展現笨港本地郊行的盈虧、在集貨和銷售體系中的角色，且指出 19 世紀末鴉片是資生號主要出口商品之一。與鹿港郊商不同的是，其商業投資和合夥的對象僅限於北港至府城地區，而未及中國內地。不過，本文指出資生號採用蔭股和身股方式分配和照顧同宗族人，是較新的論點，但卻缺乏實際論證，應該是未來值得再討論的課題。此外，卓克華於 2007 年將原來於 1990 年由前衛出版的《清代臺灣的商戰集團》，重新整編成《清代臺灣行郊研究》一書。⁸⁰ 該書共八章，文章內容與前書大致相同，僅將其過去相關的新竹、澎湖、艋舺等郊的研究，增補為第七章和第八章以及附錄，可說是卓氏行郊研究的完整版。

林滿紅向來致力於日治時期貿易史的研究。其〈日本の海運力と「僑郷」の紐帯：1930 年代の臺灣——滿洲間貿易を中心に〉（日本海運勢力與僑鄉的紐帯：以 1930 年代臺灣與滿洲的貿易為中心）一文，⁸¹ 以臺灣和滿洲的貿易為例，指出 1931-1939 年間，由於日本帝國整備海運、銀行及冷藏設施，加以實施關稅優待、匯率均一化等政策，使得臺灣和滿洲間的貿易大增。但直至戰爭末期，日本帝國的壓力仍無法完全戰勝原先臺灣與華南「僑郷」之紐帯，才是當時東亞秩序再編的實象。

綜觀 2007 年的貿易史研究成果，早期和清代有較新的議題和討論，戰後貿易史顯然較不受重視，猶有很大的研究空間。即使以清代而言，洋行、臺灣與島外各地的貿易、重要進出口商品貿易、華洋商之間的競合以及貿易與生活文化等課題，仍待努力。

九、總論與展望

總觀 2007 年臺灣經濟史的研究成果可見，產業史研究成果最多，土地史、交通史以及工業科技史居次。

特別是交通史和造船史研究，可說是豐收的一年，有不少新發現。

其次，由於近來各種公私藏文書檔案的公布或翻譯，使得臺灣經濟史不斷發掘出新課題，且修正或補充過去的論點，是可喜的現象。舉例而言，土地改革研究突破過去傳統說法，重新從日治時期的租佃問題至戰後政策的施行，檢討土地改革的得失。日治至戰後大型企業的接收與重建、技術傳承則已開展出新論述。又如清代郊商的投資與貿易經營，也有較清楚的釐清。

再者，以時間斷限來看，日治時期和戰後時期研究成果分佔總量的 37%（37 篇）和 33%（33 篇），是臺灣經濟史研究的主流。這個趨勢與臺灣史整體研究趨勢相同。清代臺灣經濟史研究僅佔 17%，明顯偏少。清代臺灣史研究的沒落是必須正視的問題。另一方面，隨著荷蘭和西班牙文獻的翻譯出版，近來早期經濟史研究漸增，且因研究者不再侷限於少數能直接閱讀荷蘭文的歷史研究者，各種研究領域的學者皆可以從自己的專業知識出發，對荷治時代的歷史發展提出各種新解釋或開發出新議題。但僅有 5 篇，整體成績仍偏少。

最後，世界經濟史的研究，目前盛行從長時期來觀察整體經濟政策、制度、經濟行動以及經濟發展的變遷。然而，臺灣經濟史研究至今顯然習慣以政權斷代為限，跨時期研究偏少，僅有 8 篇，佔 8%。從長時期來觀察臺灣經濟的發展，以與國際對話，應是未來亟需努力的方向。

整體而言，2007 年臺灣經濟史研究成果在史料運用、新課題開發以及舊說補正方面已有一定成果。但是，誠如前述，經濟史研究逐年減少、部分領域過度集中某一時期、有些研究主題瑣碎化和缺乏論述，以及進行國際學術對話的需要，是未來必須進一步突破的問題。

80 卓克華，《清代臺灣行郊研究》（臺北：揚智文化，2007 年修）。

81 林滿紅著，河原林直人譯，〈日本の海運力と「僑郷」の紐帯：1930 年代の臺灣——滿洲間貿易を中心に〉，收入松浦正孝編，《昭和・アジア主義の実像：帝国日本と臺灣・「南洋」・「南支那」》（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07），頁 344-371。